

华东地区日伪关系的实像

——张生等著《日伪关系研究——以华东地区为中心》读后

张连红

近10余年来,二战史的研究逐渐成为全球史学界研究的热点。其中关于战争期间通敌现象和傀儡政权的研究引起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最近,南京出版社出版了南京大学历史系张生等人合著的《日伪关系研究——以华东地区为中心》(下文简称《日伪关系研究》),这是一本别具新意的佳作。作者以华东地区为中心,选取日汪关系中四个极具解剖意义的个案,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多层次多视角地揭示了日汪关系的实像,读后让人获益匪浅。

一 伪政权研究中的学术趋向

在推介《日伪关系研究》的学术价值之前,笔者想就近几年来国内外伪政权研究中学术趋向作一简要回顾。在汪精卫公开投敌之后,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曾大声疾呼:自现在开始,在抗战胜利前,谁言和平,谁就是汉奸!在当时国家存亡生死攸关的情形之下,陈嘉庚先生的话虽然言辞激烈,但却起到了振聋发聩的起用。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下,汪精卫及其傀儡政权理所当然成为汉奸的代名词。时过境迁,当人们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时,随着海内外大量史料的不断挖掘,其研究成果也开始突破原有视角,呈现了许多值得关注的学术趋向。

国内学者对伪政权的学术研究起步于1980年代中期,北京师

范大学蔡德金教授和复旦大学黄美真教授等搜集整理出版了一大批伪政权的史料,并据此出版和发表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他们为开拓和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近几年来,国内关于伪政权的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特别是在伪基层政权、沦陷区民众角色、意识形态、日伪经济掠夺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就。台湾学者的研究则比较多地集中在汪精卫政权上,以蒋永敬、邵铭煌、罗久蓉、许育铭和刘熙明等人的成果最为引人注目,他们一方面充分利用收藏在台北的档案资料,另一方面吸收了欧美及日本学者研究成果,在论述过程中较为偏重阐述伪政权(特别是汪精卫伪政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海外学者(主要是欧美和日本的学者)的研究以英文和日文资料为中心,其研究成果别具特色。在研究视角方面,他们在研究伪政权上层的同时,将很多精力放到伪政权控制的下层社会,探讨伪政权控制下城市与乡村的社会实态。日本学者则以安井三吉、浅田乔二和2004年初不幸去世的古厩忠夫教授为首,他们更多着力研究日本对沦陷区政治经济的控制。在分析伪政权的性质方面,他们不太接受“卖国求荣,为虎作倀”的简单分析,他们“一方面承认这些傀儡政权受制于日本而缺乏独立地位,一方面也强调它们争取较大自由性的努力”。^①加拿大学者巴雷特(David P. Barrett)还将中国伪政权同重庆抗日政权以及同时代欧洲的伪政权进行横向比较,得出了许多颇具创意的结论。

上述海内外学者的研究为揭示战时傀儡政权真相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最近几年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些学者从汪精卫等伪政府要员自我表白的史料中,来审视战争期间的伪政权现象,一些非历史学工作者也插足这一领域。他们或公

① 王克文:《欧美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开出版著作,或在网上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从发表的一些论著来看,他们在阐述伪政权特别是在评论汪精卫政权时,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足:一是缺乏历史学研究者的冷静,更多地以情感因素代替理性学术评判,他们同情汪精卫等汉奸的投敌“苦衷”,甚至试图为汪精卫等汉奸“翻案”。二是在作出价值判断时,往往从汉奸个人的经历与遭遇的视角出发,忽视历史时空的大前提。他们对于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残酷屠杀强奸中国百姓的丑恶行径置若罔闻,他们也不能正视中国军民誓死拒当亡国奴、反对强暴强权的民族抗争精神,反而迷恋汉奸的“曲线救国”骗人理论,其所得结论自然有违历史真相。三是片面强调伪政权与日本政府和占领军之间的冲突与斗争,无限放大伪政权同抗日政权之间的有限合作,以此说明伪政权的非傀儡性质。这些论点貌似合情,却极不合理。笔者将这类学者戏称为“历史情感派”^①,他们的论点对于主流史学界而言无疑是一大挑战。最近在读了张生等著《日伪关系研究》一书后,让人备感欣慰,笔者认为这部视野开阔、史料扎实、文笔洒脱的学术著作正是一部回击挑战的佳作。

二 日汪关系的实证研究

《日伪关系研究》全书共分八章。在导论部分,作者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国内外有关伪政权研究的学术史;第一章讨论了中国历史上的汉奸现象及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第二章宏观阐述了抗战爆发后日本利用奸伪的策略以及华东地区伪政权的形成;接着全书重点用四章的篇幅,选取日汪关系中四个极具解剖价值的个案,分别从清乡、粮食政治、上海市政权和汪伪特工兴衰等着手,

^① 也有学者认为这类学者的历史观是“自由主义史观”。

深入考察了日伪关系的实践操作层面;最后两章则考察了国、共抗日政权对日汪关系的影响。全书紧扣日伪关系这一主题,从不同主题不同层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较为生动客观地再现了抗战期间日汪关系演变的复杂进程。同以往学术界有关伪政权的研究成果相比,该书学术价值自不待言。针对少部分学者研究汪伪政权过程中出现的偏向解读,笔者认为该书在下面三个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第一,通过实证研究剖析了汪伪政府傀儡政权的本质。以往学术界在论述汪精卫政府的傀儡性质时,从汪精卫的出逃、日伪条约的内容以及道德层面等宏观方面来分析者较多,而从微观实证视角来阐述者较少。《日伪关系研究》一书通过具体事件如清乡、粮食政治、伪上海市政权及汪伪特工的兴衰等各个视角来透视汪伪政权的傀儡性质。如在第四章论述清乡时,作者从日汪清乡运动的目的、清乡的酝酿与发起、清乡的过程等方面,深入探讨了清乡运动过程中日伪之间的实质关系,尽管汪伪政府试图通过清乡运动在民众中获得“独立”形象,但是,无论是主持清乡的人选,还是清乡过程中伪军的指挥权等核心权力方面,日方丝毫没有放手。又如在讨论伪上海市政权时,作者分析表明上海伪市长的人选如傅筱庵、陈公博等都必须得到日本方面的首肯才能就任;上海市政府的一切运作,基本上均为无处不在的日本顾问和特务机关操控,各项事务,如没有顾问的签字,各种命令都是无效的;而特务机关(特别是梅机关)则对各级伪政府官员的思想动态一直进行严密监控,即便是汪伪政权中二号人物陈公博在担任伪上海市长期间也没有实权,陈曾把自己比作一家大旅馆的“首席侍者”,还说要当好这个市长,他必须具备:“十分强壮的心脏,带些麻木的神经,眼睛要半闭,耳朵要半聋。”(该书第176页)再比如作者通过考察汪伪政权的支柱汪伪特工的兴衰后,表明特工头目李士群的飞黄腾达

与他 1943 年 9 月被毒毙均由日本方面完全操控。全书虽然没有设专门章节来讨论汪政权的性质问题,但是读者在阅读每一个章节的论述时都能得出,尽管汪政权从它成立起就一直试图摆脱日方的控制,但是其“傀儡政权”性质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改变。

第二,通过实证研究呈现了日汪合作、冲突的复杂多元关系。虽然汪政府是日方一手扶植而成立的傀儡政权,但是汪伪政权同日方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之间在利益上也存在冲突甚至斗争。作者的实证研究向读者呈现了日伪之间既合作又冲突的复杂多元关系。作者指出:“就汪精卫政权而言,它是依靠日本的军事力量而建立起来的,离开日本占领者,它根本无法生存下去,日汪的合作从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双方对等的基础上,这已经决定了汪伪政府的自始自终的弱势地位。但这些并不表明,汪伪政权在这种关系中,就完全处于一种人云亦云、对日本占领者亦步亦趋、没有一点‘自主性’的状态之中。”(该书第 68 页)在汪伪政权存在的五年中,其一直试图实现对其统治区域的有效控制,增强自身政权的运作能力,尽量减少其政权的傀儡色彩,在民众中树立合法独立政权的形象。随着战局的变化,日方对汪政权的要求也不得不作出妥协与让步,这一此消彼长的互动过程生动地呈现出日汪既有合作又有斗争的复杂关系。如在论述日伪关于设置清乡机构的权限时,作者详细描述了日汪围绕成立“一元化”还是“二元化”机构相互之间所进行的较为激烈的争论以及最后妥协的过程。在讨论汪伪统治区的粮食政治时,作者通过日汪粮食统制机构的演变,呈现了日伪双方为了争夺粮食收购权而不断进行的激烈争斗。在围绕控制伪上海市政权方面,作者专门辟出一节从经济、人事和军队三个方面论述了日汪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第三,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国、共抗日政权制约日伪关系演变的内幕。作者在考察日伪关系演变时,敏锐地意识到国、共抗日政

权是制约日伪关系演变十分重要的因素,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尚少有专文论述。作者在该书最后用两章篇幅,论述了国、共抗日政权在政治、金融和军事等方面影响制约日伪关系演变的内幕。例如在论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日汪关系的政治影响时,作者着重分析了汪伪争夺国民党政治符号的目的;在金融方面,作者十分深入地剖析了法币对日本军票、伪政权中储券的巨大牵制作用;在军事方面,作者指出国民政府军的强大压力是汪伪获得不断扩军的借口,但是,与此同时日军为了控制伪军则不断向伪军中派驻“指导要员”,甚至“像和桥镇保安队这样的基层伪军中也派驻 10 人”(该书第 267 页)。到了战争后期,在日本战败已大势所趋的情况下,重庆抗日政权对于日汪伪关系的制约作用已日益突出,汪伪内部无论是政界还是军界头目纷纷同重庆暗通款曲,无人再愿意为日本卖命了。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汪伪政府在战争期间既不能挣脱日本的控制,在战争后期也不得不暗中竞相投奔重庆政府,其天生缺少“独立性”的要素。作者在分析中共抗日政权对日伪关系的影响时指出,中共在利用军事打击手段来激化日伪矛盾的同时,还通过制造“白皮红心”、“两面派”等政治手段,灵活运用“打打拉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打了又拉”的策略,使伪军产生对日军的离心力,从而达到削弱其战斗力的目的。在讨论日伪关系时能考虑到国、共抗日政权的影响,极具新意。

另外,作者在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特别注重将其置于中国抗战甚至整个二战历史的大背景下来考察,视野开阔,评价客观公正。

三 今后共同面临的课题

《日伪关系研究》一书虽然是多位年轻学者集体合作的成果,

但是全书视角新颖,体系一贯、思路与文风相近,实难能可贵,它的出版无疑会极大地推动日伪关系研究的深入。当然,由于该书是第一本以日伪关系为专题研究的学术著作,其存在的不足之处,笔者认为这也是我们学界同仁今后需要共同面临的课题。

一是如何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入揭露伪政权的“和平”理论。在实证研究日伪关系的过程中,读者完全可以通过具体的个案来透视汪伪政权的傀儡性质,也可以清晰地把握日伪之间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多元关系。但是,汪伪的“曲线救国”理论和其为了摆脱傀儡色彩、强化“独立”、“自主性”形象所作的各种努力,确实能够迷惑相当一部人,使人们从情感上无法将汪伪同傀儡政权划上等号。因此,从理论上厘清傀儡政权的特征、内涵、类型显得十分重要。

二是在研究日伪关系时应加强不同傀儡政权之间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在日本侵华期间,国内出现了无数大小、类型不同的傀儡政权,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蒙疆伪政权、伪满政权等。日本对不同的傀儡政权所采取的统治方式尚有许多差异,实际上对同一个伪政权在不同时期,随着政局的演变,其殖民统治政策也有较大变化。如汪政权成立初期的日伪关系同 1943 年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之后相比就有很大差异。探究不同类型傀儡政权(甚至可以将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扶植的傀儡政权纳入比较视野之中)之间的差异以及同一类型不同时期之间的变化,都会加深我们对傀儡政权本质的认识。

三是日伪关系不同层面的个案研究仍需加强。《日伪关系研究》一书选取清乡、粮食政治、上海市政权和汪伪特工的兴衰等四个视角成功地进行了解剖分析,但是,日伪关系中诸如日汪条约的谈判及签约的过程、汪伪政权成立与人员组成、日本租界的归还、伪政权对英美的宣战、奴化教育、顾问制与特务机关对伪政权的控

制等都可以单独成章进行深入剖析,选取的个案解剖越多,日伪互动关系的实像就会越清晰。另外,在该书已讨论的一些个案中,其有些内容由于史料不足的关系,其挖掘尚不够深入。

(作者张连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荣维木)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

2004年10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第一研究部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125.9万字。该书概要介绍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755人(正式代表547人,侯补代表208人)名单及简历,并附有未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侯补委员的人员名单及旁听会议人员名单及简历。